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演变、成因、影响与调节政策选择

胡晶晶，曾国安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地区差距的扩大虽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性质具有双重性，但地区差距长期持续扩大所造成的现实和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必须予以关注。中国地区差距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予以调节是必要的，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从而促使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旨在对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对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地区差距扩大造成的和可能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并阐述我们关于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看法。

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演变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演变趋势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内涵十分丰富，表现也是方方面面的。本文仅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中国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变动的基本情况。

1. 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或竞争力大小最基本的总量指标，其年增长率的变动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从表 1 可以看到，1979~2004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 11.2:9.9:9.1，东部地区分别高出中部地区 1.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 2.1 个百分点。这 26 年间，中国三大地区 GDP 增长率的变动以 1990 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时间段：1979~1990 年，东、中、西部地区 GDP 增长率较为接近，东部地区 GDP 增长率的年均值只比中部地区高 0.8 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 1.0 个百分点；而 1991~2004 年，东、中、西部地区 GDP 增长率则出现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 GDP 增长率的年均值比中部地区高出了 1.7 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 2.9 个百分点，在这一时间段内，三大地区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距值远远高于前一个时间段。

表 1 1979 ~ 2004 年中国三大地区 GDP 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单位：%

年份	GDP 增长率			差距值	
	东部 a	中部 b	西部 c	东部与中部 a-b	东部与西部 a-c
1979	7.6	9.7	4.3	-2.1	3.3
1980	10.2	6.0	10.2	4.3	0
1982	10.5	10.3	10.0	0.2	0.5
1984	16.0	15.2	15.8	0.7	0.2
1986	7.9	6.6	5.8	1.3	2.1
1988	11.8	9.4	10.9	2.4	1.0
1990	6.0	4.7	6.2	1.3	-0.2
1992	19.0	12.8	9.6	6.2	9.4
1994	15.7	13.4	10.1	2.3	5.6
1996	11.2	12.8	9.7	-1.6	1.5
1998	9.9	9.0	8.7	1.0	1.2
2000	10.0	8.8	8.7	1.2	1.2
2002	10.9	10.1	10.1	0.9	0.9
2004	12.2	13.3	11.8	-1.1	0.4
1979 ~ 2004	11.2	9.9	9.1	1.3	2.0
1979 ~ 1990	9.7	8.9	8.7	0.8	1.0
1991 ~ 2004	12.5	10.8	9.6	1.7	2.9
差距值 -	+2.8	+1.9	+0.9	+0.9	+1.9

说明： GDP 增长率系按可比价格计算。三大地区的 GDP 增长率是各个地区内省市 GDP 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1979 ~ 2004、1979 ~ 1990、1991 ~ 2004 的 GDP 增长率为年均增长率。差距值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1998 年以前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999 ~ 2003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 ~ 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 2004；2004 年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版)》(网址：<http://202.114.65.32>)，2005 年 10 月 14 日。

经济增长速度东高西低的总体格局，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 GDP 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持续扩大。从表 2 可以看出，就 1978 ~ 2004 的年均值而言，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 GDP 的绝对差距为 14 346 亿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47.85%，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 20 680 亿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75.07%。这 27 年间，中国三大地区的 GDP 变动也可以 1990 年为界，分为两个时间段。1978 ~ 1990 年，东部地区

与中部地区 GDP 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仅为 2 027 亿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41.89%，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也只有 3 463 亿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73.09%；而 1991~2004 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 GDP 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则扩大到了 25 786 亿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53.37%，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了 36 666 亿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76.91%，在这一时间段内，三大地区之间 GDP 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远远高于前一个时间段。

GDP 日益向东集中的结果是使东部地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越来越大，而中、西部地区的贡献率越来越小。1978 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 GDP 的 53.4%，中部占 31.3%，西部占 15.3%；2004 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 GDP 的 61.0%，中部占 26.6%，西部占 12.4%，与 1978 年相比东部地区对中国 GDP 的贡献上升了 7.5 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 4.6 个百分点和 2.9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的 GDP 只相当于东部地区 GDP 的 43.7%和 20.3%。

表 2 1978~2004 年中国三大地区 GDP 的变动情况

年份	GDP (亿元)			绝对差距 (亿元)		相对差距系数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西部间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西部间
1978	1 819	1 065	520	755	1 299	41.48	71.40
1980	2 300	1 369	638	931	1 661	40.47	72.24
1982	2 808	1 661	767	1 147	2 041	40.85	72.68
1984	3 752	2 239	1 015	1 513	2 737	40.33	72.95
1986	5 143	3 001	1 348	2 142	3 795	41.65	73.79
1988	7 922	4 304	1 997	3 618	5 925	45.67	74.79
1990	9 986	5 479	2 686	4 507	7 299	45.13	73.10
1992	14 744	7 235	3 608	7 509	11 136	50.93	75.53
1994	26 748	12 357	5 757	14 391	20 992	53.80	78.48
1996	39 529	19 167	9 614	20 362	29 915	51.51	75.68
1998	48 115	23 114	11 552	25 001	36 563	51.96	75.99
2000	57 740	26 266	13 203	31 474	44 536	54.51	77.13
2002	70 744	31 385	15 891	39 359	54 853	55.64	77.54
2004	98 626	43 062	20 038	55 564	78 587	56.34	79.68
1978~2004	26 877	12 531	6 198	14 346	20 680	47.85	75.07
1978~1990	4 708	2 681	1 244	2 027	3 463	41.89	73.09
1991~2004	47 464	21 677	10 797	25 786	36 666	53.37	76.91
差距值 -	+42 756	+18 997	+9 553	+23 760	+33 203	+11.48	+3.82

说明： GDP 按当年价格计算。三大地区的 GDP 是各个地区内省市 GDP 的加总。1978 ~ 2004、1978 ~ 1990、1991 ~ 2004 的 GDP 为 GDP 的年均值。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系数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绝对差距 = 大值-小值，相对差距系数 = (大值-小值) / 大值 × 100%。

资料来源：同表 1。

2.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以从多个侧面来衡量，如工业化水平高低、经济结构的转换、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等，但这些都最终体现在综合产出效率——人均 GDP 中。

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总体格局一致，中国三大地区的人均 GDP 也呈现出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排序。从表 3 可以看出，1978 年以来，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相对差距则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 V 型变化过程。以 1990 年为界，中国三大地区的人均 GDP 变动也可划分为两个时间段：1978 ~ 1990 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呈缓慢拉升之势，相对差距则呈缓慢缩小之势，两者呈反方向变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仅为 649 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46.95%，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也只有 751 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53.88%；而 1991 ~ 2004 年，三大地区间人均 GDP 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均呈加速扩大的趋势，两者变动方向相同，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 GDP 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扩大到了 6 126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53.37%，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了 7 195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62.75%，在这一时间段内，三大地区之间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远远高于前一个时间段。

表 3 1978 ~ 2004 年中国三大地区人均 GDP 的变动情况

年份	人均 GDP (元)			绝对差距 (亿元)		相对差距系数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西部间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西部间
1978	688	333	310	355	378	51.56	54.94
1980	819	409	368	409	450	49.99	55.00
1982	929	489	432	441	497	47.42	53.52
1984	1 176	646	548	530	628	45.09	53.39
1986	1 539	840	721	698	818	45.38	53.15
1988	2 196	1 186	1 001	1 010	1 195	46.00	54.41
1990	2 631	1 448	1 282	1 183	1 349	44.96	51.28
1992	3 776	1 851	1 631	1 925	2 145	50.98	56.80
1994	6 602	3 042	2 481	3 560	4 121	53.93	62.43
1996	9 517	4 553	3 489	4 964	6 028	52.16	63.34
1998	11 523	5 393	4 157	6 130	7 367	53.20	63.93
2000	13 698	6 045	4 758	7 653	8 940	55.87	65.26

2002	16 490	7 208	5 717	9 282	10 773	56.29	65.33
2004	22 356	10 036	7 786	12 320	14 570	55.11	65.17
1978 ~ 2004	6 494	3 005	2 401	3 489	4 092	50.48	58.48
1978 ~ 1990	1 400	752	649	649	751	46.95	53.88
1991 ~ 2004	11 223	5 097	4 028	6 126	7 195	53.75	62.75
差距值 -	+9 822	+4 346	+3 378	+5 477	+6 444	+6.80	+8.88

说明： 人均 GDP 按当年价格计算。三大地区的人均 GDP 是各个地区内省市人均 GDP 的算术平均值。1978 ~ 2004、1978 ~ 1990、1991 ~ 2004 的人均 GDP 为人均 GDP 的年均值。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系数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绝对差距 = 大值-小值，相对差距系数 = (大值-小值) / 大值 × 100%。

资料来源：同表 1。

3.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比较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比，人们更为关注且能亲身体验到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这也是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到地区差距扩大，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的重要背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地区差距进行具体分析。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不平衡，所以，在衡量中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时，需要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情况分别进行比较。

从表 4 可以看到，就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而言，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且在 1990 年以后加快攀升。1978 ~ 1990 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呈缓慢拉升之势，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仅为 176 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19.31%，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缓慢上升，其年均值也只有 122 元，相对差距则在波动中上升，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14.09%；而 1991 ~ 2004 年，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均呈加速扩大的趋势，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扩大到了 2 014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31.18%，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了 1 735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26.04%，在这一时间段内，三大地区之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远远高于前一个时间段。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一指标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东中部间的差距都要大于东西部间的差距。

表 4 1978 ~ 2004 年中国三大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情况

年份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 全年可支配收入（亿元）			绝对差距 （亿元）		相对差距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与中 部间	东部与西 部间	东部与中 部间	东部与西 部间
1978	367	308	330	59	37	16.09	10.09
1980	482	401	408	82	74	16.96	15.39
1982	537	452	473	84	63	15.71	11.76
1984	668	541	595	127	73	19.08	11.00
1986	965	783	869	182	95	18.87	9.88

1988	1 319	1 012	1 115	307	204	23.26	15.44
1990	1 714	1 278	1 395	436	319	25.46	18.64
1992	2 380	1 701	1 949	679	430	28.53	18.09
1994	4 286	2 878	3 145	1 407	1 140	32.84	26.61
1996	5 871	4 019	4 454	1 852	1 417	31.54	24.13
1998	6 574	4 492	4 754	2 081	1 820	31.66	27.68
2000	7 682	5 165	5 681	2 517	2 001	32.77	26.05
2002	9 186	6 334	6 673	2 852	2 512	31.04	27.35
2004	11 287	7 861	7 914	3 425	3 373	30.35	29.88
1978~2004	3 725	2 596	2 766	1 129	958	25.47	20.28
1978~1990	846	670	724	176	122	19.31	14.09
1991~2004	6 398	4 384	4 663	2 014	1 735	31.18	26.04
差距值 -	+5 552	+3 714	+3 940	+1 838	+1 612	+11.88	+11.95

说明：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三大地区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是各个地区内省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的算术平均值。1978~2004、1978~1990、1991~2004 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值。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系数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绝对差距 = 大值-小值，相对差距系数 = (大值-小值) / 大值 × 100%。

资料来源：同表 1。

从表 5 可以看到，中国三大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水平变动的总体格局依然表现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排列。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且在 1990 年以后加快攀升。1978~1990 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仅为 135 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24.66%，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也只有 192 元，相对差距系数的年均值为 36.52%；而 1991~2004 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的年均值扩大到了 1 065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38.37%，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了 1 483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52.40%，在这一时间段内，三大地区之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远远高于前一个时间段。

表 5 1978~2004 年中国三大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的变动情况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 全年纯收入（亿元）			绝对差距 （亿元）		相对差距系数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与中 部间	东部与西 部间	东部与中 部间	东部与西 部间
1978	172	133	120	39	53	22.76	30.62
1980	244	190	172	54	73	22.20	29.72

1982	332	270	229	62	103	18.77	30.98
1984	453	369	286	84	168	18.53	36.96
1986	558	408	341	150	217	26.94	38.82
1988	770	506	430	264	340	34.27	44.19
1990	954	654	554	300	401	31.48	41.99
1992	1 171	717	622	455	549	38.82	46.89
1994	1 839	1 116	863	723	976	39.33	53.07
1996	2 811	1 798	1 273	1 013	1 537	36.04	54.70
1998	3 200	2 054	1 504	1 146	1 696	35.81	53.00
2000	3 341	2 071	1 569	1 271	1 773	38.03	53.06
2002	3 758	2 269	1 740	1 488	2 017	39.61	53.69
2004	4 376	2 752	2 072	1 624	2 305	37.12	52.66
1978 ~ 2004	1 687	1 069	825	617	862	31.77	44.75
1978 ~ 1990	491	356	298	135	192	24.66	36.52
1991 ~ 2004	2 797	1 732	1 314	1 065	1 483	38.37	52.40
差距值 -	+2 307	+1 376	+1 015	+930	+1 291	+13.70	+15.88

说明：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三大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是各个地区内省市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的算术平均值。1978 ~ 2004、1978 ~ 1990、1991 ~ 2004 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的年均值。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系数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绝对差距 = 大值-小值，相对差距系数 = (大值-小值) / 大值 × 100%。

资料来源：同表 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演变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不断扩大的，但这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在中国各地区经济综合发展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

第二，中国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表现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就大多数衡量指标而言，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又要大于东中部之间的差距。

第三，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中一直高于相对差距，但两者的变化趋势却都明显地分为两个时间段：1990 年以前，呈现出平缓之势；1990 年以后，则呈现出加速扩大之势。

第四，中国三大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虽然处于持续扩大的趋势之中，但一直小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且日益趋近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地区差异程度

为了判断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否过大,除了进行纵向历史比较之外,还需要作国际范围的比较。表 6 将 1994 年中国人均 GDP 的分布与一些国家估计收入的分布作了比较。表中使用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和变异系数(CV)这两个尺度来衡量人均 GDP (或收入)的地区差异。如果采用中国的第一组数据,与表中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区差距是最大的。即使选用中国*,中国的地区差距仍比除前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国家大得多。在工业化国家中,意大利和法国常被看作是南北二元性的经典例子,在第三世界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被当作不均衡发展的例子,但中国的情况比它们都严重。

表 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国际比较

国别	年份	最大值/最小值(倍)	相对差异系数(CV)
中国	1978	14.27	0.73
中国*	1978	3.87	0.34
中国	1994	13.96	0.87
中国*	1994	4.13	0.39
前南斯拉夫	1988	7.80	0.54
希腊	1988	1.69	0.10
西班牙	1988	2.23	0.17
德国	1988	1.93	0.13
法国	1988	2.15	0.26
加拿大	1988	2.30	0.28
日本	1988	1.47	0.12
意大利	1988	2.34	0.26
葡萄牙	1988	1.66	0.23
比利时	1988	1.61	0.15
英国	1988	1.63	0.15
荷兰	1988	2.69	0.19
美国	1983	1.43	0.11
澳大利亚	1978	1.13	0.05
韩国	1985	1.53	0.15
印度	1980	3.26	0.36
印度尼西亚	1983	5.30	0.46
印度尼西亚*	1983	4.00	0.34

说明: 表中计算了两组有关中国的估计值,中国包括所有 30 个省级单位,中国*则不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同时还列出了两组印度尼西亚的估计值,印度尼西亚包括首都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则不包括雅加达。

CV 是未加权变异系数, $CV = [\sum (X_i - \bar{X})^2 / n]^{1/2} / (\bar{X} / n)$, 其中 n 表示地区数, X_i 表示第 i 地区的人均 GDP (或收入), $i = 1, 2, 3, \dots, n$ 。

资料来源: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72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而表 7 表明,目前中国的地区差距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地区差距相比也要大得多。即使选用中国*,1994 年中国地区加权差异系数也高达 0.415%,高于除挪威和瑞典之外的各发达国家历史上地区差距最严重时期的水平。

虽然由于各国统计口径不同、选用地区单元不同以及每个地区的人口、面积不同,这种国际比较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但我们在总体上还是可以认为,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程度已经相当大了。

表 7 中国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地区差距最严重时期比较

国别	年份	加权差异系数(CV _w)
中国	1994	0.968
中国*	1994	0.415
各国历史上地区差距最严重时期		
英国	1937	0.116
意大利	1952	0.384
荷兰	1938	0.302
德国	1907	0.242
挪威	1939	0.424
加拿大	1935	0.237
美国	1932	0.410
法国	1955	0.305
瑞典	1930	0.539

说明: CV_w 是加权变异系, $CV_w = [\sum (X_i - \bar{X})^2 P_i / P]^{1/2} / (\bar{X} P / P)$, 其中 X_i 表示第 i 地区的人均 GDP (或收入), P_i 表示第 i 地区的人口数, $i = 1, 2, 3, \dots, n$ 。

资料来源:同表 6。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成因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距扩大,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所具有的普遍现象。但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力量,却因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体制环境等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作为

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其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成因，也更为复杂和特殊。

（一）发展基础差距

1.自然基础差距

自然基础差距包括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区位条件差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的东部地区都优于中、西部地区。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虽然自然基础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它通过生存环境的优劣、地区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等因素对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产生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自然基础的差距是中国三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也是其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2.经济发展基础差距

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即使穷国增长率快于富国增长率，仍会出现绝对差距扩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三大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首先就应该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并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3.社会发展基础差距

社会发展基础主要包括地区的人口增长状况、教育水平和社会观念等。

（1）从人口增长状况来看，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199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38%，高于这一水平的省份共有16个，西部地区就占了一半，中部地区有5个，而东部地区仅有3个。到2003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6.01%，整个西部地区除了陕西、四川和重庆之外，其余省份都高于这一水平，其中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则仍保持在10%以上；而东部地区除了广东、广西和海南之外，其余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继上海连续11年保持负增长之后，北京也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负增长。在当前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中、西部人口增长过快既降低了本区域人均经济总量水平，直接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也通过其他多种途径间接地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第一，中、西部地区人口膨胀使得其本已紧张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中、西部地区人口膨胀使区域用以满足新增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教育需求等开支增长过快，增加财政困难；第三，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过快，挤占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本，使地区经济发展由于缺乏后劲而陷入困境，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

（2）从教育水平来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口的文化素质对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加，人口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人口的总体文化素质而言，中国三大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见表8）。2003年，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占全国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比重，东部为49.97%，中部为31.35%，而西部仅为16.09%。教育发展的滞后和人口整体素质偏低，是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8 2003年中国三大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文化构成情况 单位：%

地区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东部	9.12	31.10	38.57	14.64	6.56
中部	8.11	31.85	41.54	13.63	4.87
西部	13.14	37.73	29.48	9.87	3.8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 从社会观念来看, 东部沿海地区既受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 又接受西方工业革命浪潮的洗炼, 人民群众的商品意识、市场经济意识较强, 有兴办实业和经商的良好传统。改革开放给这些地区的人们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通过勤劳致富创造了条件, 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大多交通不便、相对闭塞, 再加上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存在, 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封闭落后、较为保守, 从而约束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 中央政府的地区政策倾向

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国家实行何种地区政策有极大的关系。国家是否实行地区倾斜以及向哪里倾斜, 对于地区间发展的相对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受西方发展理论的影响, 特别是出于经济效率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考虑, 中国政府采取了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 也就是向东部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全国相应的被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种战略的实质是国家以其政策资源, 让利给某些地区的一种隐蔽形式, 享受优惠政策的区域由此获得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额外利益。这一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金融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向东部倾斜

在国家金融信贷政策方面, 政府通过国家银行的资金投放和培育金融与资本市场两个方面的政策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较高的储蓄率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存贷结合的金融政策, 使存贷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区域保持较高的相关性。以国家银行为例, 其存贷款额在区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 国家银行资金呈现出东部高, 中、西部低的梯形分布格局(见表 9、表 10)。此外, 由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时间早、程度深, 金融与资本市场发育较成熟, 国家在东部地区培育了许多金融市场, 如在深圳、上海设立两家证券交易所等, 吸引了内地大批资金的流入。

表 9 1990~1998 年中国三大地区的国家银行各项存款情况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1990	6 495.9	60.29	2 639.5	24.5	1 638.6	15.21
1991	8 396.8	60.93	3 327.4	24.14	2 057.9	14.93
1992	10 995.7	59.77	4 107.9	22.33	3 294.2	17.91
1993	13 378.9	59.77	5 015.5	22.41	3 989.7	17.82
1994	17 986.0	61.03	6 312.2	21.42	5 170.9	17.55
1995	24 018.5	61.47	8 289.6	21.21	6 767.3	17.32
1996	31 032.0	61.09	10 650.9	20.97	9 117.7	17.95
1997	38 915.0	61.66	12 432.0	19.71	11 763.1	18.64
1998	45 440.0	62.02	14 122.0	19.28	13 702.3	18.70

说明: 中国三大地区的国家银行各项存款是各个地区内省市的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加总而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表 10 1990～1998 年中国三大地区的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情况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1990	7 646.1	55.77	4 095.8	29.87	1 969.2	14.36
1991	9 124.3	55.13	4 971.7	30.04	2 455.7	14.84
1992	11 007.2	53.07	5 880.5	28.35	3 853.9	18.58
1993	13 659.3	53.39	7 126.9	27.86	4 797.8	18.75
1994	16 417.3	53.25	8 417.4	27.30	5 996.0	19.45
1995	20 190.0	53.16	10 282.5	27.07	7 509.5	19.77
1996	24 234.8	52.03	12 562.0	26.97	9 785.5	21.01
1997	31 011.1	53.17	14 877.0	25.51	12 438.5	21.33
1998	35 651.5	54.31	16 209.0	24.69	13 778.7	20.99

说明：中国三大地区的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是各个地区内省市的国家银行各项贷款加总而得。

资料来源：同表 10。

同时，国家投资政策也向东部倾斜，导致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见图 1）。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央项目投资的地区分配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也高于中、西部地区。2003 年，基本建设投资中央项目投资额中，沿海地区占 45.9%，中部地区占 25.4%，西部地区仅占 28.7%。

国家金融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倾斜，必然使东部地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进而增强东部地区筹集资金的能力，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导致了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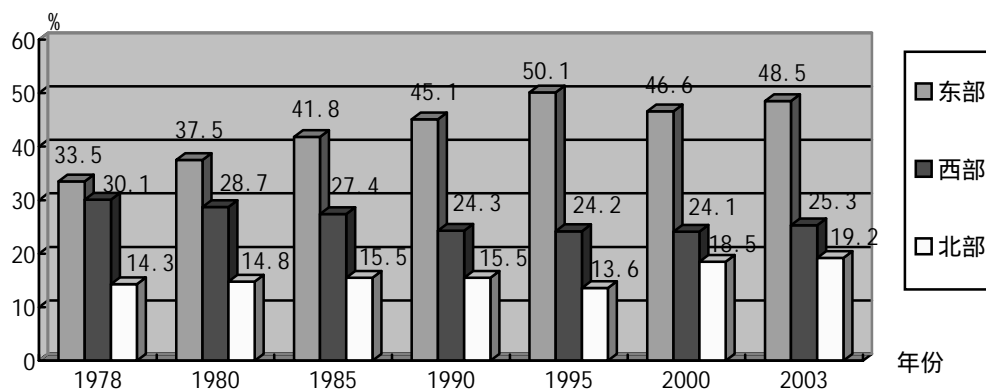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三大地区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比重

说明： 中国三大地区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比重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因为部分投资额未分区，所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投资比重之和不为 100%。

资料来源：1978、1980、1985、1990 和 1995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0 年和 2003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4。

2. 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向东部倾斜

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由沿海向内陆梯度推移，开放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先后建立了 5 个经济特区、14 个沿海开放城市、5 个沿海经济开放区，覆盖了 260 个沿海市县；全国 32 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占 26 个。这使本来就占区位优势的地区又获得了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各方面的优惠政策（见表 11）。这些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与此相比，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开放时间晚、开放地域小、开放程度较低等特征，例如中部仅建立起 4 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则至今才建立 2 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效果。正因为如此，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表 11 特殊经济区区域优惠政策

区域类型	所得税税率 (%)	其他优惠政策
经济特区	15	减免关税，进出口流转税；
沿海开放城市	24	财政返还，多交多给；
沿江开放城市	24	较大的外贸审批权；
沿海经济开放区	24	金融方面，多存多贷，差额包干；
经济技术开发区	10~15	部分立法权限；
沿边开放城市	24	灵活的出入境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5	较大的土地管理等。

说明： 其他地区所得税率 1993 年以前为 55%，1993 年以后为 33%。

资料来源：张慕、程建国《中国地带差距与中西部开发》，89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3. 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

(1) 财政政策。改革开放以后的 20 多年间，中央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政策，财政包干政策是指以某一年或前几年（通常为 3 年）的地方财政收支决算为基础来确定地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基数，基数内的财政收入由地方包干使用，超过基数部分由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进行分享。这一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地方经济利益，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被较大的调动起来。但是因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原有基础好，经济增长较快，所创造的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额也相对较大，所获得的可由地方政府独立支配的财力也相对较大，因此东部各省能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因中央政府给予的补贴逐年下降和经济增长过慢等原因，从这一政策中获得的好处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2) 税收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对各地区实施有差别的税收政策,一方面是对自治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继续给予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对外开放,对中央批准设置的一些特殊经济区域,实行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特殊区域如经济特区、保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国家对中、西部地区自治区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仅限于少数地区,具有扶贫性质,因此,中央的税收政策在总体上仍是向东部地区倾斜的。如果将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工业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而中国的矿藏资源又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情况考虑在内,实际上还存在着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税负转嫁的问题。这无疑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国家金融、投资、改革开放及财政税收等政策的东倾对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本文所提及的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几个原因或多或少都与之相关。可以说,中央政府的地区政策倾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 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的不足

中央政府作为唯一支配地区间资源再分配的机构,必须掌握充足的收入才能实施再分配政策。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补贴以实现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转移,这是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被大大削弱了,这使得中央政府行使其应有职能的能力(包括把投资资源从富裕地区调到落后地区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了。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财政收入与 GDP 之比急速下降,从 1978 年的 31.2% 降到了 1995 年的 10.7%,之后,这一比重逐渐回升,到 2003 年,达到了 18.5%,但仍然远远小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随着财政放权的开展,中央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越来越低,从 1985 年的 38.4% 降至 1993 年的 22.0%,1994 年税制改革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中央汲取能力的下降破坏了中央政府再分配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进行地区间资源再分配的余地缩小了。1978~1980 年上海上缴中央政府的收入相当于其 GDP 的 51.07%;其他东部地区也要上缴很大一部分收入,如北京 25.63%,天津 26.33%,辽宁 22.38% 等等。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中、西部一些出现赤字的省区的补贴甚至能占到它们 GDP 的 1/4 或 1/5,如对内蒙古的补贴占其 GDP 的 20.77%,宁夏占 22.01% 等等。但是 1980 年以后,东部地区采取了放松上缴税收工作的策略,它们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迅速下降,中央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补贴规模也相应的大大缩减了。1991~1993 年,上海仅向中央上缴了相当于其 GDP 8.54% 的收入。其他东部地区更少,如广东对国库的贡献只相当于其 GDP 的 0.38%。结果是 1978~1980 年间中、西部出现财政赤字的省区,到 1993 年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补贴的相对规模大大缩小,如内蒙古获得的补贴仅占其 GDP 的 7.14%,宁夏仅占 10.17%。可见,富裕的东部省区上缴中央的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中央能够转移给落后的中、西部省区的财政资源也越来越少了。

可以说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尽管中央政府有缩小地区差距的愿望,但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权力下放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调动和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因而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不可避免的扩大了。但是,经过 1994 年财税制度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的财力已有所增强,中央政府将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 要素区际单向流动

1. 资本向东部地区单向流动

从国内资金来看,其流动的基本格局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要投资,就必须先积累,资本形成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积累率的高低。从图 2 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远远高出中、西部地区的比重,较低的储蓄水平导致了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能力的低下,从而严重影响了其经济的发展。从国外资金的流动来看,也呈现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如表 12 所示,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占据了全国 90% 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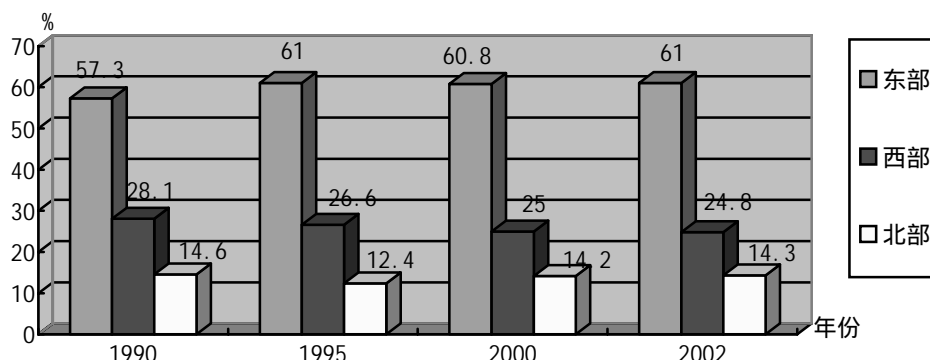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三大地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

说明：中国三大地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版）》（网址：<http://202.114.65.32>），2005年10月14日。

表 12 中国三大地区外商投资的区域分布 单位：%

地区	1990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东部	88.07	88.03	85.47	85.53	87.87	87.78	87.84
中部	9.02	9.22	10.79	10.69	8.74	7.61	9.76
西部	2.91	2.75	3.75	3.78	3.39	4.60	3.87

资料来源：刘乃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163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呈现循环关系的。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本地区，而资本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资本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和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收益低下，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再加上资本的规模效应不足，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

2. 劳动力的单向流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自发性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沿海地区，为其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原始积累和经济起飞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大量人才的流出，特别是一些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和熟练技术工人的区际流动，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为其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注入了活力，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加剧了其人才匮乏程度，无疑减缓了其经济发展的速度。

总之，生产要素的这种单向流动的特点起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最终也强化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可以说，这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最直接的原因所在。

（五）经济结构的差异

对一个地区而言，其经济结构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自然也就影响到地区间经济差

距的相对变化。

1. 所有制结构的差异

地区所有制结构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比较严重，往往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相反，非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由于企业机制相对灵活，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各个地区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除了国有经济之外，还有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非国有经济成分。但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在区际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见表 13）。由于东部地区改革力度大，所有制结构迅速实现了多元化；而中、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转型的进程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这也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13 中国三大地区非国有工业比重的变动 单位：%

地区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3 年	1995 年	1999 年
东部	21	27	41	46	67	74	77
中部	19	23	29	34	46	59	61
西部	14	15	23	23	40	47	52
全国	19	24	35	45	59	67	72

资料来源：徐建华、岳文泽：《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77 页，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2. 产业结构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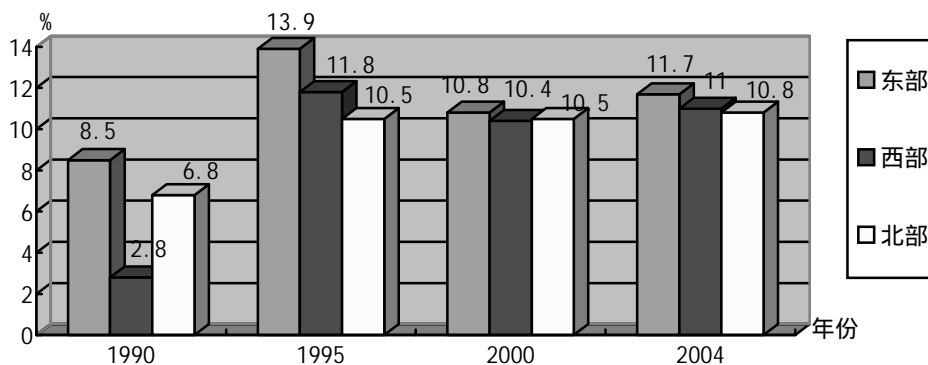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三大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

说明：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系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三大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各个地区内省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

资料来源：同图 2。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相对滞后于东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发展乏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特点十分明显，产业层次较低的特征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也远远高于其产值占 GDP 的比重。1998 年，与全国平均

水平相比，西部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7 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3.8 个百分点。其次，重工业比重不断加大，工业增长乏力。1999 年，西部重工业比重比东部高 9.93 个百分点。重工业比重大意味着轻工业发展缓慢。轻工业容易适应市场变化，产品消费弹性系数大，资本要素特别是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相对容易进入，经济活力较强，对经济的贡献率较大；而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且一般多由国家投资，通常缺乏活力，对经济的贡献率较小。正是工业内部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效率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增长乏力，占全国的比重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如图 3 所示，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直接影响了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由产业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竞争能力的差别、经济效益的差别，加速了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综上所述，造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长期扩大趋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正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才形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三大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上述很多因素在短期内也基本上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最终缩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三、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应该说，适度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对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一定程度的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一国经济没有差距，那么人们都可能产生并沉浸在满足情绪中，缺乏创新热情和发展动力。而当一国经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差距时，差距的存在会迫使欠发达地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积极汲取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进程；而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和传导机制，对欠发达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和转播效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最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高效的发展。

2. 地区差距是区域竞争和合作的基础。没有差距就无所谓优势，从而也就无所谓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贸易的产生和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区域间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如果不存在地区差距，东部的相对充足的资金和中西部的丰富能源就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更不需要建立国内大市场和国内区域合理分工了。

但是，当地区差距扩大到超过了社会承受力所能够容许的范围时，其负面影响就会占主导地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对中国及各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经济影响

1.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矛盾。面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事实，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就会以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得失来进行发展决策和管理。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例如，在区域间设置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不容许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是给想进入本地区的区外产品收取不合理的附加费用，削弱其市场竞争力，从而为本地企业占领当地市场提供保护。这些都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2.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弱化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这表现在：第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使中、西部地区财政拮据，城镇建设、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地方性科教文卫事业等方面都缺乏维持和发展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导致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削弱，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使地区经济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第二，生产要素的区际单向流动，使得中、西部地区本来就短缺的资金、人才等更加缺乏，这种状况对这些地方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显然是不利的。

3.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在客观上降低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影响了全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各地区看到了高收益的经济部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与拉动作用，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利用地方财力纷纷大力发展自己的加工工业，以至于地区经济结构趋同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纺织、机械、食品、化工等部门基本上是各个省区的主要工业部门。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各地区又把汽车、电子、建材、房地产等作为主要发展部门，出现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结构趋同降低了国民经济综合效益，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各地区的重复布点、重复引进，使得国内有限的资源的配置趋于分散化，损失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应有的规模经济，从而削弱了国民经济的质量。第二，造成同行业的过度竞争，市场提前饱和，大量的生产能力在形成过程中或刚投入运行不久就出现过剩，大规模资产被沉淀。第三，导致了地区之间经济的无序竞争，削弱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互支持力。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相互支持作用。产业结构趋同就削弱了地区之间产业上的相互配合。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争相发展附加值高的行业，以推动经济增长。在资源和要素需求相同而供给又有限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地区之间对相关资源和要素的争夺。另一方面，各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注意力都集中到高附加值的部门，必然会忽视那些附加值低的基础性产业（主要是原材料和初加工工业）。基础产业供应不足的“瓶颈制约”与中、西部资源产业开发滞后的“短腿现象”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持续性发展的后劲。第四，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投资需求的阵发性波动，成为破坏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之一。当国家对重复建设进行治理时，全国经济建设就会出现冷，而当国家放松时，各地区的同类建设又开始变热。长期如此反复，就使全国经济发展处于冷热的交替变换的波动之中，这显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

（二）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社会影响

1.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大会导致地区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扩大，不利于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往往会把现有的资源更多的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社会发展不得不置于其后。而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各级地方财政和普通群众都有了比较好的资金积累，有能力对社会事业的发展给予较好的投入，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样长期下去，就有可能使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联系因水平层次拉大而出现断层，形成地区之间社会沟通的障碍，许多地区性社会矛盾将会不断的滋生和激化，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十分不利。

2.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将造成社会劳动力的盲目流动和社会的严重失衡。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会加速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他们在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加了东部沿海城市社会发展的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基础设施的发展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给社会生活造成不便，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也加大了社会保障的负担，外来人口的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当地社会治安的压力。

3.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差异的存在和扩大对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是通过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对此不同的认识和反映而发生作用的。一方面，面对与发达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欠发达地区最明显的感受是本地区游离于或排斥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之外，没有分享到全国经济高速增长成果，从而产生心里的极大不平衡。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则认为中央采取的任何再分配政策都意味着削减他们对本地区资源的控制，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往往坚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要以效率作为决策的唯一标准，并以各种方式推托甚至拒绝向欠发达地区提供援助。一旦他们之间情绪上的对立与民族问题、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还存在引发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危险。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分裂，例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就是这样造成的。

中国更应该重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这是因为：

（1）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均贫富”的社会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这种对待贫富差距的社会背景是不利于承受较大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必然会使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在心理上失衡。这种心态的存在和蔓延对我国社会的稳

定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2)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要求。如果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而且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地区就很容易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动摇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减弱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3)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可能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根源之一。从民族的分布格局来看，东部和中部是汉族的集聚区，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则相当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从经济发达程度来看，汉族集中分布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则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如果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过大，那么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平等、社会地位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这就很有可能影响党和政府在各民族心目中的形象与威信，也违背了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一旦被外国一些别有用心势力和组织乘机加以利用，就有可能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

综上所述，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其对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引发了或可能引发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因此，不能任其发展，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缩小地区差距。

四、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政策选择

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看，造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运作自发缩小现阶段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即便我们真的相信市场力量能够最终缩小地区经济差距，这一过程也必然是时间漫长，代价巨大的。因此，政府应该也必须在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 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长期战略选择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基本实施的是倾向于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均衡发展战略，着力追求生产力的空间均衡布局，甚至不惜以放慢或牺牲有条件迅速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为代价，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实施的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虽然成功的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一批资金与要素集聚中心或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带动了我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但也使核心地区与周围地区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地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这两种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都没有有效解决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相反，它们对国家长期发展造成的影响在现阶段越来越凸现出来。近几年来，国家充分重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战略在目前来看有其合理性，但长期推行又可能造成中部地区发展的落后，造成新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因此，从长期来看，较为理想的选择是坚持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涵义：

1. 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和核心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共同进步。在承认和重视各地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使东部地区的再发展得以持续，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够加快，绝对差距逐步得到控制，相对差距不断得到缩小。

2. 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方法是促进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关联，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本来就有互补性，只有互通有无，才能各取所长，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区域之间在经济上一旦达到了关联互动、正向促进的状态，就会把它们从利益上联合起来，使各地区自觉的消除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协调相互关系，开展合理的贸易，相互帮助和促进。

3. 衡量地区经济是否协调发展，可以把地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否同向增长、经济差距是否趋于缩小作为检验标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各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必须是同向增长的，不应该再重复过去那种以牺牲某些地区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另一些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做法。当然，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只是同向增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朝着不断缩小的方向发展，才能达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谐、经

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共同富裕、社会的共同进步的目的。

总之，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差距问题，就必须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既是地区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的反映，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二）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具体政策

1. 国家适当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完善中、西部地区自身的融资体系。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直接原因在于资金的不足，因而要缩小地区差距首先要保证中、西部地区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鉴于东部地区已经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国家应该逐步调整投资比重，使投资适当向中、西部倾斜，并将投资与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除了依靠国家财政性投资外，还要积极扩大金融政策的作用，充分发挥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作用，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在间接投资融资方面，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倾斜，央行可以考虑给予中、西部金融机构特殊的信贷政策，例如，给中、西部金融机构确定较优惠的存贷款比率、资产负债比例等考核指标。同时，为了配合国家提高对中、西部财政投资力度的政策，商业银行要积极认购国债并适时发放相应的配套贷款。还要充分利用政策性银行来加大对中、西部的开发力度，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适时发放专项金融证券来解决中、西部地区中长期信贷资金不足的问题。在直接融资方面，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扩大融资渠道和融资能力。争取将更多的中、西部地区具有地区性产业发展优势的企业和主导性产业中的企业上市，推动中、西部地区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已经上市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国有股、法人股占有较大比重的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法人结构。拓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增加证券种类，并利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固定资产融资租赁、实体投资等吸引民间闲散资金，带动民间投资。

2. 多种形式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第一，扩大沿边地区开放。中国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历史上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为中国沿边地区开放创造了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目前中、西部地区资金短缺、技术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中劳动力和技术是低层次的结合，因此可以以内陆贸易为基本趋向，利用边境贸易所提供的包括边民互市贸易、小额贸易、地方政府贸易和国家政府贸易等多种形式发展中、西部进出口，并可借道发展转口贸易。第二，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沿江开放战略的机遇，充分利用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作用，加快沿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利用外商投资的领域和渠道，以 BOT、TOT 等方式进行利用外资的试点，允许外商开展项目融资，支持中、西部属于国家鼓励类和允许类企业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等方式吸引外资。第三，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联系和经济技术合作，与沿海外向型企业联合办厂，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发展外向型经济。

3. 调整税收政策，适当向中、西部倾斜。首先，应该逐步取消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由于东部相对于中、西部已经处于优势地位，取消向东部地区倾斜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不会损害东部地区自身的增长潜力。其次，应该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为辅的税收政策取代原来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我国的产业重心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能源、原材料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而大多数中、西部省市的比较优势集中在资源开发和资源加工领域，少数省市形成了一些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比较优势行业。因此，应该对这些产业的发展适当给予所得税和行为税优惠，例如，对在中、西部地区新办交通运输、电力、水利、邮政、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加工企业实行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政策，对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鼓励类产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明确不给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西部地区在交通、地域、人口素质等投资环境上的劣势，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国内外投资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4. 实行规范的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中央政府要建立强大的中央财政，提高自身的财政汲取能力，为平衡地区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当中央政府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实施干预时，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其次，重新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资金转移支付的方式，按照“因素法”确定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额。对特定地区转移支付的多少必须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赋税高低、城市化进程、

民族风格、人口状况、教育水平和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结合起来。按照这些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计分标准，各地统一计分，从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再次，借鉴外国经验，建立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高，中央财政十分有限，而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直接表现方式是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充裕、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拮据，加之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提供相同公共服务所需单位成本较高，因此，为解决这种财政横向失衡及实现全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中央支付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横向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间实现核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

5. 加快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第一，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多设备技术落后，社会包袱沉重，产品多为军备和原材料型，附加价值低，但同时又是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的支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这些企业面临产品竞争、人才竞争和资金竞争，企业发展困难，除了国家有责任对这类企业加强技术改造的资金投入之外，这些企业自身也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困境。第二，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的程度如何，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与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西部地区应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地区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要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乡镇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乡镇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办乡镇企业，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第三，积极支持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除了国家要鼓励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之外，各地方政府应将支持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必须为其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消除金融、税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政策歧视，保障企业主的合法权益。

虽然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这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展步伐，从而促使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的最终实现。

注释：

本文以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为分析单位来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所谓的东、中、西部地区是以中国政府在“七五”计划报告中对大陆的国土（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未包括在内）所作的战略性划分为根据的。其中，东部地区是指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部地区是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 9 个省区；西部地区是指新疆、西藏、宁夏、陕西、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四川、重庆等 1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实，从经济、人文发展水平来看，内蒙古、广西显然更应该归入“西部”的范畴。虽然本文关于西部的数据分析并没有包含这两个省区，但本文中“西部”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还是包含了内蒙古和广西的。

Romer, Paul,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6), pp.1002-1037.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相关数字计算而得。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210 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年版。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134 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年版。

雷敏、底瑜：《试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成因》[J]，49 页，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1] 陈栋生，魏后凯、陈耀、刘楷：《西部经济崛起之路》[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版。

[2] 王绍光，胡鞍钢著：《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年版。

- [3] 张慕萍, 程建国:《中国地带差距与中西部开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4] 胡鞍钢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1 年版。
- [5] 张敦富,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 [6] 徐建华, 岳文泽:《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2 年版。
- [7] 王小鲁, 樊纲:《中国地区差距:20 年变化趋势和影响》[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8] 刘乃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9] 罗格纳·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M], 中文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 [10] 雷敏, 底瑜:《试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成因》[J], 载《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 [11] Romer, Paul,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0(6) , pp.1002-1037.

On the Evolving Trends , Reasons , Influences and Regulating Policies of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1970s

Hu Jing-jing, Zeng Guo-a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seven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three grand regions in China have taken on a long-term expanding trend. This trend has exerted dual influence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its negative influences are extensive and serious, so we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can't be resolved radically in a short time, bu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some proper regulating policies to hold back expansion of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rrow thes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end.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ulating policies

收稿日期: 2005-11-24 ;

作者简介: 曾国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晶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